

從能力取向觀點探討多元因素交織下 多重問題的困境與契機

劉珠利

壹、前言

日本放送協會（簡稱NHK）曾經製作數百集有關在日本的少女，如何在家庭破碎、逃家逃學、為養活自己而到酒店上班、遭遇男性不當對待、未婚懷孕、無力扶養小孩而必須出養剛生下的孩子、甚至酒店開始以一條龍的方式經營托嬰、幼兒中心，讓帶著孩子的少女繼續在酒店上班，以賺取生活費的真人真事（日本NHK特別採訪小組，2014／2021）。這些影集後續並集結成書，以文字呈現這些少女所陷入的惡性循環，這本書後來也翻譯成繁體中文在臺灣發行。事實上，少女所經歷如前述的惡性循環，並非只發生在日本，在臺灣社會工作實務中，也經常協助這樣的陷入逃家、到八大行業上班、原本認為可以保護自己的男性變成暴力相向的恐怖情人，然後再度開始生命中的另外一個問題，陷入多重問題相互交織困境中

的女性案主（王玥好，2021）。

為何在不同社會脈絡中的少女或是女性案主同樣都陷入如前述的多重問題相互交織的困境之中？女性主義角度的關懷，強調必須關注多元因素交織（intersectionality，意指種族、階級等因素相互交錯，為免贅述，這部分將在下一段落中說明）的影響，在多元因素交織下，這類女性案主的問題與因應又更加複雜，面對這樣多元因素交織下複雜問題的相互交織的困境，社會工作師如何提供協助打破困境，讓這類女性不再反覆地回到社福系統之中？目前為止筆者尚未找到文獻具體的爬梳這種相互交纏交織的細節，並提出打破這種困境的實務工作對策。因此筆者就以這個問題為主題，開始從現有理論文獻中尋找答案。在筆者廣泛閱讀、搜尋文獻過程中發現能力取向理論（capability approach，簡稱CA）聚焦於討論經濟弱勢（poverty）以及多元因

素交織所造成的不平等環環相扣的複雜性 (Robeyns, 2003), Shukla (2020) 指出, 能力取向理論提出擴展弱勢者的能動性 (agency expansion) 是對弱勢者增能 (empowerment), 弱勢者能動性的擴展可以跳離困境開啟正向循環。Robeyns (2003) 以及 Shukla (2020) 的論點似乎指出能力取向的理論內容可以回應筆者前面所提出的問題, 因此引發筆者進一步集中探討能力取向的內容以及這個理論對於這類女性在多元因素交織下陷入多重問題相互交織的困境的看法, 期望能夠針對落入困境的狀況提出實務工作上能夠著力的地方。女性所面對的多重問題交織的困境, 以經濟弱勢與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交織為多, 因此本文聚焦於這兩個問題交織的困境。由於本文是初探性質, 因此筆者參考 Robeyns (2003) 的看法, 針對這麼複雜的狀況先嘗試以分析現有已經發表的女性案例與相關實證研究的文獻, 爬梳能力取向觀點下所看到的複雜交織, 再進行田野工作。接下來第二段將整理討論筆者從所服務學校的圖書館電子資料庫中鍵入親密關係暴力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經濟弱勢 (low-income)、女性倖存者 (female survivors) 關鍵字後所搜尋到討論在多元因素交織下陷入經濟弱勢與親密關係暴力相互交織困境的女性案例與實證研究文獻, 作為了解她們狀況樣貌的基礎, 第三段將討論能力取向

的理論內容以及運用這個理論的實證研究, 以對能力取向內容有深入的理解, 第四段將嘗試從能力取向觀點爬梳分析文獻中女性在多元因素交織下落入多重問題困境的可能成因, 最後將對社會工作實務提出建議。

貳、在多元因素交織下的經濟弱勢與親密關係暴力問題：現有文獻的女性案例與實證研究

一個人生活於社會中, 包括多重身分象徵, 如: 種族、社會階層、經濟階層、宗教、性傾向等, 人的經驗與遭遇, 特別是遭遇歧視與壓迫, 都和這些因素有關, 亦即多元因素交織是人類經驗的特質 (Crenshaw, 1989)。Maitra (2013) 研究從第三世界女性移民至白種人為主的加拿大, 發現這些女性在社會上處於邊緣弱勢狀態, 她們的處境與問題是在種族、性別、父權文化、階級等因素交錯下形塑而成的, 她們也是在這樣交錯的因素中協調/找到因應的方式, 呼應了女性主義及能力取向所強調的要理解弱勢人口群就必須理解多元因素交織的處境, 女性所面臨的多元因素交織就成為必須先討論的觀點。

多元因素交織的概念主要說明父權社會文化中, 男性掌握了權力與資源成為支配者, 相對於男性, 女性所能擁有的權力

與資源就必須依靠男性分配，因此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就成為附屬者，父權社會形塑的女性性別角色規範是順從、照顧他人、自我犧牲、以別人的需要為優先，這樣性別角色規範常見於東西方文化，而在亞洲以儒家思想為主的社會中則特別強調、規範家庭中的角色與責任是女性的生活／生命的重心，並以性別做為家務分工的基礎（劉珠利，2006）。父權社會不光制定女性性別角色規範，也制定了以男性為主的社會制度，例如：早年只有男性才可以擁有從政權、繼承財產制度、接受教育等的權利（顧燕翎等人，2020）。父權社會的性別角色規範、社會制度就使得女性落入相對弱勢的位置，女性擁有相對較少的權力資源，而男性則可以掌控女性的方式對待女性，階級、種族等就如同性別一樣，有權力的群體掌控較沒有權力的群體，因此當女性來自於階級弱勢、弱勢族群或是資源弱勢（經濟弱勢）的情況，在性別、年齡、族群、階級、身心障礙等因素多元因素交織下就更是處於多重弱勢的處境。性別角色規範、社會制度等，也是女性因應問題、解決問題的策略依據，在這樣的脈絡中，女性可以運用的解決問題方式就受到侷限（Maitra, 2013）。當女性在多元因素交織處境又面對經濟弱勢與親密關係暴力問題的樣貌為何？以下是從現有文獻中整理的發現。

當原生家庭或是自組家庭不再是溫

暖能夠滋養家庭中的成員，甚至充滿暴力時，逃離這個家庭是家中成員常用的方法，當遭遇家庭暴力、不同形式的虐待的少女或是女性逃離家庭、逃學之後，包括吃、住、生活開銷等的生存問題就是立刻必須面對與處理的問題。Goodman等人（2009）指出在諸多限制的環境中，任何可以立刻抓住讓她們生活下去的資源，就成為她們的選擇，這樣的選擇並不一定是她們喜歡的，通常是在能夠安排與能做的決定太少的情況下的選擇，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很多時候她們（女性）立刻選擇進入八大行業或是非典型雇用的工作，因為這類型職業的入門門檻低，成為她們最可接近與使用的資源（村石多佳子、宮崎亮希，2014／2021）。此外，在日本這群女性以性產業作為最終的生存方法，原因除了女性沒有太多的工作技能、是一條容易走的路之外，令人驚訝的是性產業也提供了協助與關心，提供了支持，吸引也安撫逃家後的女性（村石多佳子，2014／2021）。此外，跟周圍的人建立工具性的關係，讓這類關係成為協助她們解決生存問題的資源也是常見的方式（Davis, 2007），這類人際關係提供了支持，然而由於工具性的關係性質偏向有目的的性質，是為了獲得某些東西為目的，屬於交易交換的原則（黃光國、胡先縉，2010），當她們先從這些工具性關係獲得生存的協助之後，有時候為了回饋或是還

對方人情，也不得不去做一些並不樂意去做、甚至是違法的事，成為一刀兩刃的關係。

當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又處在經濟弱勢的情況下時，這類女性採用的是在成長環境中學習到的處理親密關係暴力方式、經濟弱勢、資源缺乏的狀況下，亦即性別、社會階層、次文化等多元因素交織的情況下，所協調選擇出的方法。如同宮崎亮希（2014／2021）所言，她們所使用的方法不合理，但是這是她們從小所知道的方法，用一般所謂的「努力」掙脫是困難的。Purvin（2007）針對美國Massachusetts三個城市的低收入家戶女性為對象的研究中發現，因為她們的經濟問題使得她們只能居住於社會住宅之中，而美國的社會住宅規定不能有親密關係暴力問題發生，當遭遇親密關係暴力時，這群女性為了保有唯一能夠居住的地方時，就會隱忍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問題，隱忍的因應方法無法解決衝突的問題，甚至可能讓衝突的問題更為複雜與惡化。St. Vil等人（2017）以美國東部低收入、黑人女性為對象研究中發現，她們因應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方式，大致以她們的族裔常用的禱告、尋求教會支持、離開暴力關係或是以暴力回擊對方、尋找經濟獨立的管道、物質濫用等方法，令人深思的是她們會企圖尋找或是建立非正式與正式支持，但是通常都不是很成功。Williams與Mickelson

（2004）提醒，女性周圍可能圍繞的是有缺陷的資源網絡（impaired resources），提供的是有問題的支持（problematic support），這也是必須檢視的，然而前述研究顯示，這些女性都嘗試解決陷入多重問題的困境，雖然宮崎亮希（2014／2021）指出她們的處境讓她們使用的不是一般的方法，無法有效解決問題可以理解，然而St. Vil等人（2017）的研究顯示研究中的女性也是採用一般熟悉的嘗試尋找連結資源的方法解決問題，但是為何無法解決問題或是不成功呢？的確需要進一步探討。

長期陷入多重問題交織的困境下，導致這些女性容易發展出精神疾病、物質濫用、有自殺意念等的問題，這些身心的狀況使得日常生活的功能變差，再加上經濟不佳、缺乏交通工具等因素而無法就醫，長時間沒有修復的功能就可能變成永久無法回復的功能，生命品質變的惡劣（Bhandari et al., 2011; Reviere et al., 2007; St. Vil et al., 2017）。

此外，Bhandari等人（2011）的研究也指出，有些遭遇這類型狀況的女性不知道如何使用資源，使用資源的障礙變成無法解決問題困境的原因。但是令人深思的是，有些遭遇這類型狀況的女性可以運用資源來解決問題，對照Davis（2007）指出，這群女性採取建立正反效果兼具的工具性人際關係解決問題，宮崎亮希

(2014/2021) 所採訪的日本年輕女性個案，也以一邊打工，一邊以學業貸款方式就讀幼教專校，希望未來能夠去考證照有一技之長自立於社會，設立清楚的目標且努力達成。這樣兩極的結果如何產生？需要進一步探討。

女性在多元因素交織下面對經濟弱勢與親密關係暴力問題相互交織，有不同的因應方式，可惜的是很多因應方式衍生後續更多的問題，有些看似運用了方法來解決，但是卻達不到成效，有些卻能朝解決方向前進，如何解讀這樣的狀況？以下是能力取向的觀點的分析。

參、能力取向理論內涵：能力、功能、自由、轉化因素、能力剝奪與能動性

能力取向觀點是由諾貝爾經濟學得主Amartya Sen所提出，Sen提出有別於一般經濟理論中以國民生產毛額（GNP）或是收入做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而是提出以衡量人民的福祉（well-being）是否可以達成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這個思維已經成為聯合國發展方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簡稱UNDP）衡量經濟弱勢的指標（UNDP, 1999），亦即，經濟弱勢是因為人們被剝奪機會與資源的結果，取代了過往以衡量收入多寡作為經濟弱勢指標的思維

(Pyles, 2008)。因此能力取向觀點認為能力（capability）意指一個人所想要的及這個人所擁有的權力如何擷取他身邊的資源的助益去做他想要的，一個人必須有自由（freedom）去選擇（choice）他們所認為有價值的目標，才能讓能力展現促進福祉（Nussbaum, 2000）。

後來Martha Nussbaum根據Sen的觀點，發展出更為具體的內容，她指出她所發展的能力取向觀點是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強調完整的人類發展過程，是需要能夠達成知道自己在世界中可以做什麼（able to do），想要成為什麼（to be），擁有選擇的自由，並且能夠做到自己要做的，反之就是被剝奪的發展過程。

據此觀點Nussbaum（2000）發展出十個核心能力（註1），分別是：

1. 生命（life）：不會感受到不值得存在這個世界上，不會因為其他因素而使壽命變短
2. 身體健康（bodily health）：有足夠的營養健康與居住
3. 身體不受侵犯（bodily integrity）：有遷移的自由並免於被侵犯或是騷擾，有生育、性的自主權
4. 感官與思考上的能力（sense, imagination and thoughts）：有足夠的教育且能夠計畫未來找到自己生活的意義免於痛苦
5. 情緒（emotion）：情感得以發

- 展，能夠有依附關係，能夠去愛去關懷他人，並免於焦慮恐懼與創傷
6. 實際的推理 (practical reason) : 能夠反省自己的生活並且選擇生活方式
 7. 建立關係 (affiliation) : 能夠與他人建立關係並免於被壓迫或是被羞辱
 8. 與其他物種的關係 (other species) : 與大自然的所有物種一起生活
 9. 娛樂 (play) : 能夠娛樂
 10. 對於自己的環境有掌控權 (control over one's environment) : 有政治權力並且能夠擁有資產與尋找工作及與其他人平等。(轉引自劉珠利, 2021, 頁7-12)。

Nussbaum (2000) 也解釋了每一種核心能力的屬性：生命是十個核心能力的開端，實際的推理與建立關係是關鍵核心能力，健康及身體不受侵犯這兩項核心能力，就個人的選擇只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功能，最終還必須由政府的介入才能完全的達成。十個核心能力之間會相互影響，並不是各自獨立，某些核心能力還會促使其他核心能力功能的發揮，其中一個核心能力不好會連帶影響其他核心能力的狀況，例如：健康或教育會影響參與有意義活動的核心能力發展，與人建立關係的能力會支持情緒發展能力的發展 (Ward,

2018)。十個核心能力必須全面得到發展才是功能健全的人。

Nussbaum (2000) 所發展出的每一項核心能力在不同的情境脈絡、文化下，落實的情況將會不同，實際的操作也須視各國發展的情況而定，這十個核心能力還必須放在功能 (functioning, 意指一個人能力實際達成的狀況)、選擇、機會的脈絡下一起思考，才能理解這十個核心能力的內涵。筆者摘要Nussbaum (2000) 所提出的主要觀點以及一些研究能力取向的學者所衍生的闡釋如下。

一、Nussbaum (2000) 指出，每一個人 在每一項核心能力下能夠發揮到何種程度的功能，每一個人都不相同，有些是因為被剝奪機會與資源，有些是因為自己選擇的程度。Nussbaum (2000) 認為長期被剝奪導致個人的功能無法展現的狀況若屬於結構上的問題，就是政府必須介入的；某些人卻經由選擇放棄某些功能，例如，一個人決定放棄生命，選擇自殺，這個部分就必須經由細密的辯論，才能處理這個議題；只要是個人自由的選擇自己想要的功能展現的程度，而個人的核心能力沒有被犧牲，也是可以接受的。健康與安全在某種程度之下，可以由人民選擇要達到何種程度的功能，尊嚴在某種程度上實在無法由人民個人自由選擇，實在無法說政

府讓人民自由選擇生活在屈辱、缺乏尊嚴的狀態下。

二、任何政策或是方法都應以個人自由與功能／能力能夠達成／發展為終極目標，如果僅將獲得資源作為終極目標，個人在過程中所遭遇的權力不平等、受壓迫、被剝奪而無法達成福祉的情況將無法呈現（Kimhur, 2020）。政府都應該要介入社會上任何會影響個人能力發揮的制度，任何政策都要思考如何提升個人的能力，了解能力被剝奪的本質與來源，這才是促進社會正義與平等的核心（Kimhur, 2020）。

三、資源（金錢、物品、食物、房屋、公共設施等）如何讓個人的能力能夠發展，功能能夠發揮，要視個人能夠從資源中擷取多少助益而定，換言之，這些資源需要一些媒介的轉化才能促進功能發展，這些媒介在能力取向理論稱之轉化因素（conversion factors），包括個人、人際、以及結構三個層面的因素。個人層面：包括身體狀況、年齡、殘障、個人特性等，尤其意指精神與生理方面的狀況；社會層面：包括在家中的位置、社會規範、社會制度、公部門、機構等；結構環境層面：包括自然環境、全球化、文化中的刻板印象等，個人、社會、結構環境因素相互互動之

後，促成一個人去取擷取某種資源的助益，進而用來發展個人的能力／功能，最後達成個人的福祉，因此個人能否透過轉化因素與擷取資源的助益進而達成功能，是能力取向理論關注的重點（Ward, 2018）。

四、能力取向觀點認為能力不是一種被動的狀態，還包括個人主動去做的部分，也就是個人具有能動性（agency），能動性意指有選擇的自由、實際的推理以及與人建立關係（Crocker, 2008）；個人能夠選擇／設定目標，可控制決定並達成目標（Keleher, 2014）。擴展個人的能動性就能達到增能（empowerment as agency expansion），經由擴展人們的能動性進而做出改變（Shukla, 2020）。從能動性的三個具體內涵來看：設定自己覺得有價值的目標、覺得自己有能力與可以控制（包括內外控信念與自我效能）、以及真正追求目標達成（與決策系統協調），在父權社會中，女性要能展現能動性就牽涉到外在環境中的權力結構、決策模式、社會規範、資源狀況等，因此女性可以在現有的權力架構中追求目標，也可以努力去改變環境然後追求目標（Donald et al., 2017）。實務工作上具體的做法是：個人有獲得訊息的管道、能夠參與以及融入、有外在

的資源 (Shukla, 2020)。

性別是一個會造成能力被剝奪的因素。女性在多數文化社會脈絡下，多數遵守父權社會所創造的女性性別角色認同，決策的權力、資源分配的權力等都以男性為主，因此女性能獲得的資源分配相對較少，能力的發展以及將能力轉化為功能的條件相對就會有影響 (Robeyns, 2003)，此外，女性的偏好 (preference) 也可能是社會建構而成的，而不是真正女性選擇的發展目標 (Nussbaum, 1999)。一個人因為性別使得擁有的十個核心能力較少，就表示這個人是被壓迫、削權、經濟弱勢 (Keleher, 2014)。能力取向同時認為全球許多女性仍然缺乏自由／選擇的自由，因此在一些文化中仍然存在殺死女嬰的現象，而女性仍然被限制於從事金錢價值較低甚至無償的工作，如：無償的照顧工作 (Pyles, 2008)，因此影響女性的能力。

即使在現今的年代中，一些文化仍然存在限制女性自由的作法，Topuz與Erkanli (2018) 針對741位土耳其女性，訪問她們想做卻不能做的事，結果顯示，她們想做卻不能做的事是：看電影、拜訪家人、與朋友出去、購物、獨自旅行、開車、晚上外出、有自己獨處的時間等，不能做的原因是：無法負擔、丈夫不允許，家中長輩不允許、社會壓力、因為工作而無法有多餘時間、缺乏自信等。她們想成為卻不能成為的事是：擁有職業、成為一

個管理者、成為一個機構的一分子、成為一個政黨的黨員、擁有一個頭銜、能夠在社會中發聲、接受教育等，不能成為的原因和前面不能做的原因是相同。Topuz與Erkanli (2018) 認為結果顯示的就是女性在父權社會中因為性別關係而被界定為附屬於男性的角色，因此無法去做或是去成為想要的，是被剝奪能力的具體展現。這個結果呼應了 Nussbaum (1999) 所指出的女性選擇的目標是被社會建構的，不一定是女性真正的興趣。

能力取向理論中評估問題的焦點，就是將問題視為是能力被剝奪 (as deprivation of capabilities) 而造成的。然而被剝奪的能力又會因為身分、性別、種族、文化的不同 (多元因素交織) 而有差異，因此某個問題要視為是那些被剝奪的能力的列舉就相當複雜。Alkire (2007) 以及Kimhur (2020) 都運用多重向度能力 (multi-dimensional capabilities) 的觀點來討論與問題相關的被剝奪能力。Alkire (2007) 指出，將經濟弱勢視為一個能力被剝奪的問題是毫無疑問，然而因為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因此要舉出放諸四海皆準、經濟弱勢的問題就是那一些能力被剝奪是困難的，如果要研究長期經濟弱勢的問題，又必須考慮時間累積的效果，在這樣情況下要舉出那一些能力被剝奪就又更加困難。然而Alkire (2007) 仍然嘗試以現有文獻

去整理那一些能力（僅為能力的種類）被剝奪而導致經濟弱勢。在Alkire（2007）的文章中指出，每一位學者或是大規模的研究、方案所指出所被剝奪的能力不盡相同，Alkire（2007）所整理出的不同學者／研究所舉出的經濟弱勢視為被剝奪的能力，從現有資料以及人類需求的角度來說，經濟／生計，教育，壽命（包括營養以及早夭）是主要被舉出的被剝奪的能力，其次因為國情文化不同，重視人權的國家從人權的角度來說，也有學者／研究舉出人權、能夠實際推理進而內在整合與自我決定，與人建立有價值的關係，也是因為經濟弱勢而被剝奪的能力。經濟弱勢是因為前述的能力被剝奪，長期能力被剝奪，就會導致未來的脆弱（Alkire, 2007）。Kimhur（2020）則以房屋問題為例，指出無法有良好的居住房屋視為被剝奪的能力，被剝奪的能力就包括：（缺乏）經濟／財務能力、（缺乏）資訊運用能力、（缺乏）正式職業頭銜而能夠獲得的購屋方案、性別不平等。換言之，從實際分析過程中，將問題視為多重向度的能力剝奪，是能力取向理論的觀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Robeyns（2003）提醒能力發展是一個過程，因此任何研究或是角度所舉出的，某個問題可視為是那一些能力被剝奪，都是一個大致的樣貌，然而當人在性別、年齡、種族、階級等的多元因素交織下，被剝奪的能力種類

與程度是相當多元與複雜的，換言之，即使是遭遇同一問題的人們，因為不同性別或是年齡等身分類別有所差異，這一群人所遭遇的問題的程度以及被剝奪的能力項目與程度就不同，這也是實務工作者需要了解的差異性。

當女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時，Nussbaum（2000）明確指出這就是剝奪女性身體不受侵犯的核心能力，由於核心能力之間是相互影響的，因此當這個核心能力被剝奪時，還會進一步影響自由以及經濟／生計的機會，被剝奪那一些核心能力非常明確。當女性陷入經濟弱勢及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多重問題時，Pyles（2008）從能力取向的角度分析經濟弱勢的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的處境指出，女性在家中缺乏平等權力、必須承擔家中無償照顧者的工作等，已經讓女性轉化資源的能力受限，而親密關係暴力限縮了女性倖存者的經濟、身心健康以及與外界資源接觸的機會與能力，導致功能發揮產生問題，都讓女性倖存者落入更為弱勢的處境。雖然Pyles（2008）的研究沒有舉出這樣的女性被剝奪那一些能力，但是指出女性轉化因素被限制的來源，亦即女性在家中被對待的位置導致了女性轉化因素有限。可惜的是，從Nussbaum（2000）提出理論內容之後，目前筆者僅搜尋到Pyles（2008）從能力取向的角度針對經濟弱勢與親密關係暴力的多重交織提出一

些分析，然而Pyles（2008）並未再加入多元因素交織的分析，如果要更了解這個議題，就需要更多的分析，也是本文嘗試做出的貢獻。

簡言之，能力取向理論聚焦於能力發展與增能，聚焦於增加機會與自由的選擇，了解發展能力過程中因為內外因素而導致被剝奪、被限制的過程，強調人的價值。

肆、從能力取向觀點檢視現有文獻在多元因素交織下陷入經濟弱勢與親密關係暴力問題相互交織的女性

如同前面所討論，將問題視為能力被剝奪，而不只是資源缺乏，更可以豐富討論的內容，使得政策目標能夠增進人們的福祉（Kimhur, 2020），一些研究將能力取向的觀點運用於分析特定議題時，分析的方法大都是：將問題視為多重向度的能力剝奪、個人因為性別、身分等所在位置關係所展現的能動性，以及政策目標是否能夠挪開相關的障礙（Buzzelli, 2015; Kimhur, 2020; Ward, 2018），因此筆者也嘗試運用這些分析角度來分析前面篇幅文獻中所顯示在多元因素交織下陷入經濟弱勢與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多重問題的女性。

一、經濟弱勢且遭遇親密關係暴力是多重向度的能力剝奪？是那一些能力被剝奪？

無庸置疑，親密關係暴力是對倖存者身體不受侵犯、生計／經濟的剝奪（Nussbaum, 2000），Goodman等人（2009）的研究明顯呈現當少女在成長過程當中遭遇家庭破碎、暴力而逃家逃學，生存成為重要的困難時，營養／維持身體所需成為最重要的事，生命是所有核心能力的開端（Nussbaum, 2000），當所有的能力的發展回到開端時，可以理解其他的能力就無從發展／發揮或是受到限制。Purvin（2007）以及St. Vil等人（2017）的研究顯示，經濟弱勢且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女性倖存者的情緒以及與人建立關係的能力受到影響，因此毫無疑問，親密關係暴力是多重向度能力剝奪的問題，甚至可以危及生命的開端。經濟弱勢已經被多位學者指出應該視為是多重向度的能力剝奪（Alkire, 2007），重點是當這兩個問題相互交織時，可以發現生命、經濟、教育、人權、身體不受侵犯、情緒、推理思考、與人建立關係的能力都受到剝奪，甚至都可以危及生命的開端，影響甚鉅。從這些被舉出的被剝奪的能力，提供了一個經濟弱勢且遭遇親密關係暴力被剝奪能力的樣貌，協助倖存的女性發展被剝奪的能力就成為實務工作的重點，當然，實務工

作者也必須注意，個別女性倖存者的階級、種族等因素多元因素交織下，被剝奪能力的差異性。另外，前述每一個能力被剝奪的程度是否相同？在目前的文獻上無法比較，也是在運用上必須注意的。

二、經濟弱勢且遭遇弱勢女性有內在與外在的轉化因素？

弱勢女性如果能夠將個人、社會、結構層面的資源轉化為發展功能／能力的力量，就能夠達成能力發展，然而在前面有關在多元因素交織下的經濟弱勢與親密關係暴力問題的交織篇幅中的研究都清楚呈現，弱勢女性所能擷取資源助益的個人轉化因素（身體狀況、年紀、殘障、個人的特質）相對薄弱與不利，村石多佳子（2014／2021）以及宮崎亮希（2014／2021）所報導的女性案例都是年紀小的女性，年齡的關係讓她們尚無法發展出複雜的使用資源技能，再加上她們在不平等的家庭環境中失去自由成長發展的機會，年紀、外在環境以及在家的處境的轉化因素相互交織下，不難理解為何這些女性無法擷取一般資源的助益來幫助自己。Reviere等人（2007）以及Bhandari等人（2011）的研究顯示長期陷入多重問題的女性，是因為精神等方面產生障礙、甚至成為永久的損傷，而無法使用資源，個人內在永久性的損傷如何限制擷取資源的助益可以理解，如果再加上使用交通工具

的困難，就難上加難。此外，環境中存在一些轉化因素，例如，教會、社會住宅政策，目前各國也陸續發展相關的社會福利措施協助她們，但是或許因為個人內在轉化因素程度不同，因此即使建立了資源，協助的成效也不一。這個角度為St. Vil等人（2017）的研究所顯示的，這些女性嘗試連結資源解決問題，但是卻無法擷取資源的助益的狀況，提供了可能的解釋。從這個結果就顯示，協助增強女性的轉化因素，促使她們能夠擷取資源的助益，是實務工作的重點之一。當然，外在資源是否有問題，也是實務工作者在增強女性的轉化因素時，必須小心檢視的。

三、弱勢女性因為性別、身分等所在位置所展現的能動性為何？

如果選擇的自由、實際推理能力、與人建立關係、能夠理解自己身處不平等的狀況下，然後去設定自己未來努力的目標並且達成，是能動性的展現與脫離困境的方法，很顯然前述研究中的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能力被剝奪，那麼前述定義的能動性被剝奪是可以預見的，然而Davis（2007）、St. Vil等人（2017）以及宮崎亮希（2014／2021）的研究及案例都點出，部分女性可以運用與人、與教會建立關係為自己解決問題並設定努力的目標，這個結果顯示出兩部分可能的意義，一方面顯示即使成長於或是陷入經濟弱勢與

親密關係暴力多重問題交織的處境的女性，部分女性仍然保有一些能動性，但是這些能動性是在現有的權力架構、社會規範與資源中運作展現，尚無法以改變權力結構的方式展現，另外一方面顯示與人建立關係是重要的女性能動性，呼應了Nussbaum（2000）所指出的與人建立關係是關鍵核心能力，以及Donald等人（2017）指出，在現有架構中運作能動性的觀點。這個分析也提醒實務工作者既然展現能動性是改變的起點，協助女性案主從建立與人的關係是一個建立能動性的切入點，之後再逐漸擴大至建立思考與選擇，是實務工作可以運用的原則。

伍、結論與對社會工作實務的建議

本文採取能力取向的觀點分析現有文獻中所顯示的，在多元因素交織下陷入經濟弱勢與親密關係暴力多重問題相互交織的（年輕）女性的困境的可能原因與協助策略，發現經濟弱勢與親密關係暴力問題困境應被視為是多重向度能力剝奪，剝奪了生命、經濟、教育、與人建立關係、推理思考、身體不受侵犯、情緒、人權等能力，在多重能力被剝奪情況下，許多人生問題無法解決就落入多重問題的狀況，這群女性在年紀、性別、身心狀況、在家處境等內外轉化因素受限狀況下，擷取

資源的助益的成效有限，使得問題持續存在，然而部分女性仍然能夠展現設定努力的目標的能動性，能動性能夠展現以與人建立關係為主，其他則較無法展現。本文嘗試從能力取向爬梳非常複雜的在多元因素交織下的多重問題交織，根據分析結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 一、將經濟弱勢與親密關係暴力問題視為是多重向度的能力剝奪，一方面可以理解問題不是表面所見的問題，而是來自於能力被剝奪，因此即使女性案主在接受協助之前做過任何超過實務工作者想像的因應策略，都是在僅有的能力中的策略，從女性案主被剝奪的能力來理解就可以避免產生責怪受害者的態度；另一方面實務工作者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到在問題形成過程中，女性案主所受到的不平等與壓迫，以及所需要發展的能力。
- 二、針對年紀輕、身心障礙、在家中受到不公平對待處境的女性案主，由於這類型女性案主即使有資源，但是因為內外轉化因素薄弱且不利，因此能夠擷取資源中的助益進而發展自己的能力，達成福祉的狀況有限，因此提供資源只是開端，實務工作者還必須協助女性案主學習與發展具體的擷取資源的助益的方法。舉例來說，案主能夠使用資源的前提是案主有相關資源的知識以及能夠去除案主本

身和資源使用之間的阻礙（鄭麗珍，2020），潘淑滿（2021）指出許多臺灣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女性都很少使用正式資源，可能的原因跟她們不熟悉求助資源有關，綜合兩位學者的看法，協助女性案主擷取正式資源的助益，首先必須協助案主了解正式資源使用的程序與規定，此外，也必須和案主討論使用這個正式資源的可能阻礙，例如使用法律或是心理諮商的資源時，與律師、諮商師溝通的阻礙與解套的方法等。換言之，細緻的處理女性案主使用正式資源的困擾與阻礙，是能夠擷取正式資源助益的直接服務方法。至於如何協助女性案主擷取非正式資源的助益則相當複雜，實務工作者也較少著墨於此，因此需要另外的探討。

- 三、可從建立女性案主實際思考、建立人際關係作為啟動能動性的開端，也就是增權的開端。
- 四、從能力取向檢視親密關係暴力倖存者的問題可發現，倖存者的人身安全不會是協助的終極目標，是協助的過程目標，倖存者自由選擇所想要達成的功能／能力，並協助她們達成，才是政策的終極目標。本文並未檢視相關的政策，因此未來可以臺灣的相關政

策作為檢視的目標，檢視《性別工作平等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相關法規是否將能力的達成作為終極目標？是否可以將能力作為政策的終極目標？

本文初探性的從現有文獻資料中爬梳複雜的議題，如同Robeyns（2003）所說的，從文獻中整理出某個議題是那一些能力被剝奪與相關因素是開始的步驟，接下來還需要專家學者、甚至是問題的倖存者來指出被剝奪的能力與相關因素的狀況，才能真正地確認，未來期待能夠進一步進行實證研究，更為具體的探討這個角度。同時本文目前的階段需要以廣泛閱讀東西方相關實證研究做為基礎，因此現階段在本文中尚無法聚焦於單一身分類別的女性進行深入的探討，這是本文的限制，也期待未來能夠聚焦於單一身分類別的女性進行深入的探討。此外，了解能力被剝奪的狀況是一部分，政府以及政策在協助個人發展能力上扮演重要角色，這也是能力取向角度強調的，這也是未來必須整理與討論，才能完整地勾勒出協助的方向。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能力取向，經濟弱勢，親密關係暴力，女性

📖 註 釋

註1：未免讀者在閱讀上產生困擾，Nussbaum所提出的能力，均以「核心能力」一詞表示，其他學者所談的能力不一定就是Nussbaum所講的十個核心能力，因此均以「能力」一詞表示。

📖 參考文獻

- 日本NHK特別採訪小組（2021）。《女性貧困。負貸、漂流、未婚單親，陷入惡性循環的貧困女子》（李穎，譯）。寶瓶。（原著出版年：2014）
- 王玥好（2021）。〈推薦序 女性經濟弱勢，是勵馨無數服務對象的寫照〉。載於日本NHK特別採訪小組，《女性貧困。負貸、漂流、未婚單親，陷入惡性循環的貧困女子》（頁10-14）。寶瓶。
- 村石多佳子（2021）。〈「性產業」成為生存的最後希望〉（李穎，譯）。載於日本NHK特別採訪小組，《女性貧困。負貸、漂流、未婚單親，陷入惡性循環的貧困女子》（頁116-155）。寶瓶。（原著出版年：2014）
- 村石多佳子、宮崎亮希（2021）。〈非典型雇用〉（李穎，譯）。載於日本NHK特別採訪小組，《女性貧困。負貸、漂流、未婚單親，陷入惡性循環的貧困女子》（頁58-82）。寶瓶。（原著出版年：2014）
- 宮崎亮希（2021）。〈懷孕與貧困〉（李穎，譯）載於日本NHK特別採訪小組，《女性貧困。負貸、漂流、未婚單親，陷入惡性循環的貧困女子》（頁158-197）。寶瓶。（原著出版年：2014）
- 黃光國、胡先縉（2010）。《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劉珠利（2006）。《女性性別角色與社會工作：以台灣年輕女性性別角色為例》。雙葉。
- 劉珠利（2021）。〈婦女社會工作〉。載於古允文（總校閱），《社會工作概論》（六版；頁7-1-7-28）。華格那。
- 潘淑滿（2021）。《109年度「台灣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統計調查計畫」期末報告》（計畫編號：M09C7266）。衛生福利部。
- 鄭麗珍（2020）。〈以個案評估為基礎的資源管理和跨網絡合作〉。《社區發展季刊》，172，8-26。
- 顧燕翎、王瑞香、林津如、范倩、張小虹、黃淑玲、莊子秀、鄭至慧、鄭美里、劉毓秀（2020）。《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貓頭鷹。
- Alkire, S. (2007). *Choosing dimensions: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 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88. <http://doi.org/10.2139/ssrn.1646411>
- Bhandari, S., Bullock, L. F., Anderson, K. M., Danis, F. S., & Sharps, P. W. (2011). Pregnancy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How do rural, low-income women cope?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32(9), 833-854. <https://doi.org/10.1080/07399332.2011.585532>
- Buzzelli, C. A. (2015).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Rethinking agency, freedom, and capital in early education. *Contemporary Issues in Early Childhood*, 16(3), 203-213. <https://doi.org/10.1177/1463949115600030>
- Crenshaw, K. (1989).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140, 139-167.
- Crocker, D. A. (2008). *Ethics of global development: Agency, capabilit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D. (2007). Non-violent survival strategies in the fac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economic discrimination.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15(3-4), 123-149. <https://doi.org/10.1080/10926770802097293>
- Donald, A., Koolwal, G., Annan, J., Falb, K., & Goldstein, M. (2017). *Measuring women's agency*. Africa Region of the Chief Economist & Development Data Group.
- Goodman, L. A., Smyth, K. F., Borges, A. M., & Singer, R. (2009). When crises collide how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poverty intersect to shape women's mental health and coping.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0(4), 1-24.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09339754>
- Keleher, L. (2014). Sen and Nussbaum: Agency and capability - Expansion. *Ethics and Economics*, 11(2), 54-70.
- Kimhur, B. (2020). How to apply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to housing policy? Concepts, theories and challenges.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37(3), 257-277. <https://doi.org/10.1080/14036096.2019.1706630>
- Maitra, S. (2013). Perspectives on work and family lives. Exploring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South Asian immigrant mothers working from home in Toronto. In J. K. Sangha & T. Gonsalves (Eds.), *South Asian mothering. Negotiating culture family and selfhood* (pp. 150-162). Demeter Press.
- Nussbaum, M. (1999). Women and equality: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8(3), 227-245. <https://doi.org/10.1111/j.1564-913X.1999.tb00386.x>
- Nussbaum, C. M. (2000).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Cambridge Press.
- Purvin, D. M. (2007). At the crossroads and in the crosshairs: Social welfare policy and low-income women's vulnerability to domestic violence. *Social Problems*, 54(2), 188-210. <https://doi.org/10.1111/j.1564-913X.1999.tb00386.x>

org/10.1525/sp.2007.54.2.188

- Pyles, L. (2008).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1*(1), 25-36. <https://doi.org/10.1177/0020872807083912>
- Reviere, S. L., Farber, E. W., Twomey, H., Okun, A., Jackson, E., Zenville, H., & Kaslow, N. J. (2007).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uicidality in low-income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 multimethod assessment of coping factor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3*(11), 1113-1129.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07307798>
- Robeyns, I. (2003).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gender inequality: Selecting relevant capabilities. *Feminist Economics, 9*(2-3), 61-92. <https://doi.org/10.1080/1354570022000078024>
- Shukla, M. (2020). Women empowerment as agency expansion. *EP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5*(10), 168-172. <https://doi.org/10.36713/epra2016>
- St. Vil, N. M., Sabri, B., Nwokolo, V., Alexander, K. A., & Campbell, J. C. (2017). A qualitative study of survival strategies used by low-income black women who experienc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ocial Work, 62*(1), 63-71. <https://doi.org/10.1093/sw/sww080>
- Topuz, S. K., & Erkanli, H. (2018). Women in Turkey in the context of being deprived of capabilities and feasibil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19*(2), 1-13.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rd, S. (2018). *Using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with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Children's Neighbourhoods Scotland.
- Williams, S. L., & Mickelson, K. D. (2004). The nexu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poverty.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0*(3), 283-293.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03262519>